

以军人之名——三世纪危机中的先军政策探析

杨雨萌 田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中国·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 在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时期, 频繁更迭的“军营皇帝”现象给帝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军事力量逐渐主导了政治决策, 军队成为了帝国堡垒政权的核心支柱, 同时也对罗马帝国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影响。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先军政策不仅影响了军队的运作, 也在帝国的各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深刻印记。本文旨在探讨三世纪危机中的先军政策指向的两大势力, 并分析这一政策的产生的内外条件、以及实施过程, 揭示了先军政策必定走向失败的结局。

关键词: 三世纪危机; 罗马帝国; 军营皇帝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Yang Yumeng, Tian Ming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China Inner Mongolia Tongliao 028000

Abstract: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frequent changes of the "barracks emperors" brought severe consequences to the empire. As military power gradually dominated political decisions, the army became the central pillar of the imperial fortress regime,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is turbulent period,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not only affect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litary but also left a profound impact across various sectors of the empi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 major forces behind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and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is policy.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reveals that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was doomed to fail.

Keywords: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Roman empire; Barracks emperors

0 引言

军营皇帝指的是三世纪危机时期, 依靠军队夺取政权的罗马皇帝。他们多出身于行伍或行省长官, 少数为平民, 军队既是其权力的基础, 也是威胁其统治的隐患。由于军队掌握废立之权, 50年间多位皇帝轮番登台, 政权更迭频繁。为稳固地位, 军营皇帝普遍采取“先军政策”, 将军队利益置于优先, 推行军事至上的统治方针。然而, 这种政策犹如饮鸩止渴, 不断激发军队的贪欲, 加剧了政局动荡, 加深了三世纪危机。即便部分皇帝试图削弱军队影响、恢复君权, 但军队已成为难以控制的权力主体, 帝国也因此步入难以逆转的分裂与衰败。

1 先军政策的指向

三世纪危机时期, 罗马帝国的先军政策深刻体现于军队权力结构的演变, 特别是在近卫军与军团这两大军事力量上的体现尤为突出。随着皇权日益依赖军力支撑, 军队不仅是边疆防御的主力, 更成为政治博弈的核心。近卫军原为皇帝的护卫部队, 却逐渐超越“主仆”角色, 演变为

掌控皇位更替的关键力量。而军团因塞维鲁王朝的优待, 其地位迅速上升, 虽一时带来政权稳定, 却也助长了军队干政之风, 加速了帝国衰败的进程。

1.1 骄横之师——罗马近卫军

近卫军是元首制的产物, 作为“数百年历史时段内, 近卫军从无到有, 从‘安分守己’, 到不可一世, 荣辱兴衰, 波折起伏, 从不同层面折射出罗马帝政史、军事史、政治史的变迁轨迹。”这支由皇帝亲手组建、与君权深度捆绑的军队, 在帝国发展中极具影响力与破坏性。他们依附于皇权享有特权, 又常脱离控制, 形成权力依赖与对抗的矛盾格局。“正常状态下, 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间的稳定关系, 且对主子唯命是从。”一旦平衡被打破, 近卫军干政问题则将陷入覆水难收的局面。从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卡里古拉的统治算起, 首开近卫军扶持与弑杀的罗马皇帝的先河。此后的弗拉维王朝, 安敦尼王朝虽然未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叛乱, 但都相继出现过近卫军势力通过各种方式僭越罗马皇帝的事件。因此, 在处理近卫军的问

题上,罗马皇帝们常常如履薄冰,在塔西陀的《历史》中所提到的,维提里乌斯不安于近卫军的反复无常,但又忌惮近卫军的实力。于是“把他们分隔开来,继而又利用光荣的退役来缓和他们的的情绪”,采用相对柔性的方式,分化裁撤过于庞大的近卫军势力;“韦伯芟开始时任命自己的亲戚阿莱西努斯·克莱门斯担任近卫军长官,并负责重新组建近卫军。”以这样依靠血缘的方式重新掌控近卫军。然而,宠溺军队的塞维鲁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调遣部分驻扎在行省的军团迁至意大利,以此来制衡近卫军。这一举措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近卫军的存在仍然对皇帝的统治构成威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皇权与军权之间的矛盾。

1.2 堕落之师—罗马军团

从公元193年到284年,罗马历史进入了元首政治的衰落时期。军团的堕落,在塞维鲁王朝的建立时就有所端倪。塞维鲁王朝的建立不仅立足于军队,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利益。关注军人的生活,“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住在军营中,尽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塞维鲁对军队在金钱上十分的慷慨大方。给予了手下军队大量的财富。到塞维鲁在去世之前,还对继承者说过这样的话:“要和睦相处,要让士兵发财,至于其他人,则可以无视他们。”接任的卡拉卡拉,颁布法令授予了帝国所有自由民罗马公民身份,其真实动机不过是为了增加公民缴纳的税赋,以此填充其军事金库,向退伍军人发放赏金。纵观整个塞维鲁王朝的统治,皇帝们对军队的控制,可以称得上成功,三世纪的罗马社会与政局还算是相对稳定。但只依靠金钱收买军队对统治的忠诚。注定不是长久的。“务实”的罗马军人选择皇帝的标准是“单一”的,谁能够给予官兵更多的战利品、军饷、金钱谁就是他们眼中的“好皇帝”或者是“好皇帝”的候选人。这样单一的手段,对军队的讨好与放纵,给罗马帝国埋下了祸根。随着塞维鲁王朝的统治轰然倒塌,在军队上埋下的祸根已经酿成了恶果,伴随着三世纪危机,罗马帝国的动荡正式拉开了序幕。

2 先军政策的成因

三世纪危机时期是军队兴风作浪的年代。各支军团与近卫军拥立的罗马皇帝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局面的开创要追溯到塞维鲁王朝的统治,且并没有随其覆灭而消失。并在统治覆灭后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爆发。此时登台的皇帝,毫无政治传统可言,更谈不上继位的合法性,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大部分皇帝的内政治理都有不同程度

的先军倾向,即所谓的先军政策。但先军政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既有军营皇帝政权的内部土壤,也有三世纪危机时期的外部条件。

2.1 政策形成的内部土壤

一方面,对于一众行伍出身的皇帝,受军人的拥护而登高位,如马克西米努斯、德西乌斯、瓦勒良等。他们权力不属于帝国,而来源于军队。这也造成了他们首要服务对象是罗马军队而非罗马公民,并以此影响到了他们在帝国执政中的倾向,折射出先军倾向的政策变化。在科瓦路夫的《古代罗马史》中表明:“塞维鲁最后使帝国有了军事性质。”如果说,塞维鲁王朝给出身行伍的“军营皇帝”如何驾驭帝国上做出了表率,那么随之走马观花的“军营皇帝”的更迭,则加重了帝国的军事化色彩。权力为权力的来源负责,自然也产生出了先军政策的内部土壤。

2.2 政策形成的外部条件

另一方面,三世纪危机中,帝国在内部分裂和外部边患的问题十分突出,内忧外患使帝国在军事上的诉求日益增多。由于军队的贪欲日益膨胀,军队发生了不断的反叛。帝国的内部分裂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公元258年,波斯图慕斯被高卢军队拥立为元首,帝国的西部分裂为高卢帝国,占据了帝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使帝国的军事压力陡增,严重困扰了帝国稳定;公元235-285年间,罗马帝国在边疆的问题凸显,加剧了帝国外部的动乱。这是由于东面波斯人与北面日耳曼人的入侵共同造成。帝国的外部环境的不恶化,促使罗马帝国需要将更多的政治资源投入到军队之中,从而应对边疆地区的入侵。出征在外的军队的花费是永远比驻扎在行省待命的军队花费要多得多。疲于奔命处理边疆安全问题,使得投入军队的代价不断水涨船高,导致皇帝的先军倾斜愈加明显。内部分裂与外部动荡两者并行,成为了先军政策的必然条件。

3 先军政策的实施

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帝国进入了长时段的混乱。罗马皇帝被不断拥立与谋杀之间来回切换,政治进入了十分无序的阶段。多数罗马皇帝的足迹遍布帝国疆场,而非中心罗马,元老院进一步地式微,很难系统性地施政治理。皇帝越来越多地通过敕令或书信遥控统治,并不考虑元老院。由于精力和政治声望的有限,皇帝们不得不将军人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先军治理的倾向在多个方面得以体现。然而受限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努力往往难以将帝国从风雨飘摇的境地中挽救出来。

3.1 经济掠夺, 补充军需

传统观点认为, 三世纪是一个战争无处不在的时代, 战争导致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军事需求成为三世纪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军队是帝国维系生存的关键力量, 但同样地, 军队也是一部庞大的消耗机器, 皇帝无法节省军事预算。在帝国的达契亚, 多瑙河流域, 饱受战争的摧残, 经济活动难以为继。和平时期, 驻扎在当地的军团不仅是生产物质的消费者。并且随着驻扎时间的增长, 士兵又成为了当地的生产者。受他们时代思想倾向的影响, 尽管士兵有着很可观的收入, 但是, 他们仍然想尽可能成为物质生产者减少花费, 他们或者经商, 或者务农, 或者从事制造业。而在动荡期, 军队忙于战争, 使当地的经济活动趋于停滞。由于战事的吃紧, 罗马皇帝面对军纪废弛的士兵和战事需要, 容许军队就地补给。这些军队在皇帝的纵容下, 露出了丑恶本性。军队肆意征用葡萄酒、小麦、大麦和橄榄等民生物资, 并随意占据私人财产驻扎。政府虽偶有补偿, 但多数情况下以“保障文明安全”为由搪塞, 无视民众损失。除此之外, 罗马皇帝及其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经济掠夺。同样带来了同样巨大的破坏。帝国长期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 军事化的官僚集团, 无论是政府的或是行省的官吏, 其行为都和士兵无异。罗马皇帝常常要求行省官员和帝国臣民遵循“个人是为国家利益而存在的, 必要时必须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这一古老原则, 进行多余的税收和自愿的捐赠。一旦他们不能满足或者某些原因拒绝, 那么政府便会没收他们的财产。为支付军饷, 帝国不断削减银币含银量, 致使货币迅速贬值。从 215 年起, 安敦尼币和狄纳里币的银含量由 50% 降至 268 年仅 2.5%, 重量也由 5.11 克减至 2.8 克。此类竭泽而渔的手段虽缓解财政压力, 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经济危机。

3.2 军事行政, 权力边缘

在三世纪危机期间, 皇帝的合法性和统治地位往往取决于军队的支持。许多皇帝通过军事政变、军队支持或战争胜利上台, 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政治继承或元老院的批准。军队成为帝国行政体系的核心, 军政高度合一。随着局势的不断动荡, 帝国的统治不稳定因素逐步上升, 传统的行政体系逐渐失效。公元 249 年后, 皇帝将重心转向军事事务, 原本专注于民政与司法的职责被边缘化。尽管地方经济困境和权力模糊可能导致诉求激增, 但并无证据显示皇帝亲自处理了这些请求。当帝国陷入战争之中, 皇帝需要把握好最重要的一项职责, 便是指挥参与战斗的军队。由于该时期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 皇帝的军事职能变得愈发

重要。这也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罗马城失去了权力中心的光辉, 皇帝经常不呆在罗马, 而是和军队一起身处上百英里之外。出身色雷斯的野蛮人皇帝——马克西明, 在统治的 3 年中他始终懒得去罗马或者意大利走一走。即便出身贵族, 瓦勒良亦在公元 254 年登基次年离开罗马, 前往东部安提阿, 并在周边设立战地指挥部。军事沿线城市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像阿奎莱亚、拜占庭等城市在皇帝发布命令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罗马城的边缘化, 却也导致了皇帝权力根基的脆弱。

3.3 铁腕治教, 恢复传统

自元首制在罗马建立之后, 罗马皇帝不仅成为了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领袖, 也在罗马精神领域成为了象征性的权威, 承担着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传统的责任。罗马皇帝的权威与宗教高度联系, 渗透到帝国角落。从公元前 12 年起, 奥古斯都正式担任最高祭司。此后每逢新年那天, 包括元老、官员、及其军队都要宣誓效忠罗马皇帝。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 形成了后来的皇帝将前任皇帝作为神来崇拜的惯例, 并一直延续了下去。而按照以往传统, 每一任皇帝即位后, 都会要求城内各个社区进行献祭, 以此强化皇帝的神性。公元 250 年, 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发布敕令, 强制要求全体罗马公民向罗马神祇献祭。此举引发了拒绝多神崇拜的基督教的严重反抗, 造成了大规模的冲突。随后, 加卢斯和瓦勒良继位后纷纷效仿, 重新实施这一政策, 对基督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皇帝需要用铁腕重塑军队的信仰。由于军队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 军队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组织, 皇帝崇拜需要通过一种包容的宗教仪式系统与军队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系统中, 军队保持对这个多神体系的信仰是十分关键的。而在三世纪危机时期, 军队标准被军队奉为神明, 在基督教努力发展壮大年代, 这种排他性尤为明显。基督教拒绝服役的立场与皇帝的旨意相悖, 严厉的打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 强化思想终究不是一蹴而就。尽管皇帝的铁腕政策足够强硬, 但受限军营皇帝统治短暂, 这种恢复传统的手段难以持续贯彻。更多时候, 铁腕政策带来的往往是冲击, 而非根本性的改变。复古之潮变得寸步难行。

4 结语

三世纪危机时期的先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通过加强军队的地位和权力, 帮助军营皇帝们稳固政权, 但这一政策的长远影响却加剧了帝国的动荡与不稳定。军队成为了帝国政治的核心, 近卫军和军团的角色变化直接影响了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构。本质上使皇帝的权威出现了松动, 从而

影响皇帝长期执政。同时，皇帝们在强化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不得不对宗教和思想的铁腕干预来巩固统治。然而，先军政策的局限性和军营皇帝的短命特点，使得这些政策难以持续和深远地影响帝国的发展。即使在一些有为的皇帝领导下，尝试削弱军队的影响并强化皇权，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的危机。这一剂猛药试图重振帝国，但在多事之秋的三世纪，帝国难以承载这剧烈的副作用。三世纪危机中的先军政策不仅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命运，反而为其后续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参考文献：

- [1] 张晓校.《罗马近卫军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 [2] 张晓校.《罗马帝国近卫军的政治角色》《世界历史》，2019年第5期。
- [3] 张晓校.《军队堕落与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 [4] 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98页。
- [5] 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4页。
- [6] 孙犇.《罗马军团与帝国经济》《史志学刊》，2010年第12期。
- [7]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54页。
- [8]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851页。
- [9]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9页，第

147页。

[10] Mennen I. Power and status in the Roman Empire, AD 193-284. Boston: Brill, 2011, p. 36.

[11] MacMullen R, "The Roman Emperors' Army Costs," *Latomus* 43, no. 3 (July - September 1984), pp. 571 - 580.

[12] MacCulloch D.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first three thousand years. Penguin UK, 2010, p. 173.

[13] Helgeland, John. "Roman Army Religio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Part II, vol. 16.2*, eds by Hildegard Temporini and Wolfgang Haase, Walter de Gruyter, 1978, pp. 1470 - 1505.

[14]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Harvar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17, p. 271.

[15] Brauer G. C, *The Age of the Soldier Emperors, Imperial Rome AD 244 - 284*, p. 6, p. 8, p. 26.

[16] Bowman, Alan K, Peter Garnsey, and Averil Cameron,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2, The Crisis of Empire, AD 193 - 3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1, p. 58.

[17] Blois L. "The military factor in the onset of crises in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third century AD," p. 502.

[18] Birley A R, *Septimius Severus: the african emperor*. Routledge, 2002, p. 19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罗马-拜占庭帝国基督教政策研究”(20ASS002)。

作者简介：杨雨萌(1998-)，男，汉族，四川巴中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